

儒家思想何时传入欧洲,这是一个颇有趣味的问题,近年来有些学者对此已做了努力。^①

“欧洲在大发现以前的年代里对中国的认识基本上是从陆地的旅行家、探险家的各种描述的游记中得到的。”^② 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虽对中国的宗教生活有所报道,但对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几乎一字未提,难怪有人说马可·波罗只是以一个威尼斯商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③

对中国的深入认识是从大航海以后开始的。在耶稣会士到达东方以前已有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关于中国的一系列报道。葡萄牙首任赴华特使皮雷斯(Thome Pires)在马六甲所写的《东方志》(*A suma Oriental*),托旺·维埃拉(Cristqvaio Vieiro)和加尔沃(Vasco Calvo)从广州狱中所写的信(Letter From Portugues Cative In Canton)都是大航海以后西方认识中国的重要文献。^④ 16世纪上半叶有两部重要著作把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他们是

① 参阅杨焕英:《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教育科学出版社,1985年;张立文、李平主编:《中外儒学比较研究》,东方出版社,1998年;儒学在东亚的传播,近年有很好的著作,如严绍璁先生的《日本中国学史》、《中国文化在日本》,相比之下,对儒学在西方传播的研究相对薄弱。

② D·F·Lach, *Asian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p730, Chiago, 1997.

③ 参阅杨志玖:《马可·波罗在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④ 万明:《西方汉学的萌芽期——葡萄牙人对中国的记述》,《世界汉学》,第一期,第141—149页。

巴洛斯(joaõ de battos,da china e de ormuz)的《每十年史》及门多萨的《中华大帝
国史》。^①

最早向西方报道中国人精神生活特点的应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沙勿略
(Efrancois Xavier, 1506—1552)。他是第一个到东方的耶稣会士,于 1542 年 5 月
6 日到达印度的卧亚城(GOA),后经日本商人介绍辗转转到日本。日本人对中国文
化的敬仰使其感到震惊,而且日本人在反驳基督教时总是以“汝教如独为真教,
缘何中国不知有之”而对。为此,沙勿略认为,“要使日人信服基督教,莫若先传福
音于中国”。他在中国大门口徘徊数年,终不能入内,最后于 1552 年 12 月 3 日死
于中国的上川岛。

虽然沙勿略没能进入中国腹地,但他在日本及中国附近呆了多年,并时常与
中国人接触,对中国文化有所体悟,这正是他和商人出身的马可·波罗所不同的。
他在写给欧洲的六封信中说:“据曾住中国的葡萄牙人报告,中国为正义之邦,一
切均讲正义,故以正义卓越著称,为信仰基督教的任何地区所不及。就我在日本
所目睹,中国人智慧极高,远胜日本人;且擅于思考,重视学术。”^②另一封信中
说:“中国面积至为广阔,奉守法,政治清明,全国信于一尊,人民无不服从,国家
富强。凡国计民生所需者,无不具备,且极充裕。中国人聪明好学,尚仁义,重伦
常,长于政治,孜孜不倦。”^③沙勿略在这几封信中虽未提到孔子和儒家,但对中
国文化特点的概括还算准确。这是 16 世纪西方人最早对中国文化的评断之一。

中国哲学著作的第一个西传译本是范立本所编的《明心宝鉴》,书中有孔子、
孟子、荀子、老子、庄子、朱熹等哲学家的论述和格言。翻译此书的是西班牙道明
会士高母羨(Juan Cobo),西班牙文书名为:“Beng Sim Po Cam, Espejo Clar
del Recto Corazon”。^④他 16 世纪在菲律宾的马尼拉附近 parian 的华侨区传教,
以后于 1592 年经台湾海峡赴日,途中遇台风,漂至台湾,高母羨及其随行都被台
湾当地人所杀。

① 吴志良:《16 世纪葡萄牙的中国观》,《世界汉学》,第一期,第 150—161 页。关于这一方面还可参阅吴志
良:《东西交通看澳门》,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年;金国平:《西力东渐》,澳门基金会 2000 年;《文化杂志》1999 年
季号;《16—17 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观文献选集》,澳门文化署,1997 年。在此感谢吴志良先生赠送我
一批有关这方面的重要文献和著作。

② ③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一册,第 61 页,香港公教真理学会。

④ 在此感谢姚宁提供给我《明心宝鉴》的西班牙原文。

这个译本的出版年代有 1592、1593、1595 年三种说法,出版地为马尼拉。这
个译本一开始不广为人所知。后“此译本经 F·Navarrete 附于其名著 *Trantados* 之
后,在欧洲流传。因而渐广”。^① 此书 1959 年被 Carlos Canx 配上中文后重新发
表。高母羨虽不如利玛窦那样深入研究了中国文化,但他“毕竟是 16 世纪第一个
把中国文献译成欧洲语言的人”,因此在欧洲汉学史上有特殊的地位。

耶稣会士来华以后,将孔子和儒家学说向西方介绍按两种方法进行,一种是
直接将孔子及其儒家的著作翻译成西文,或用西文写出研究性著作;另一种是在
礼仪之争中,争论双方为申辩其立场,对中国礼仪风俗进行介绍,这中间自然会
涉及到祭孔问题,孔子及儒家学说的内容也间接被介绍到西方。

在中国本土第一个对儒家经典著作《四书》进行翻译的人是罗明坚,但他只
译了《四书》中的《大学》,^② 利玛窦继罗明坚后继续翻译《四书》,他在 1594 年 11
月 15 日致德·法比神父的信中说:“几年前(1591 年。——作者注)我着手翻译
著名的中国《四书》为拉丁文,它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伦理格言集,充满卓越的
智慧之书。待明年整理妥后,再寄给总会长神父,届时你就可阅读欣赏了。”^③ 但
不知何原因,这本重要的译著至今下落不明。利氏之后是金尼阁以拉丁文翻译了
五经,并在杭州刊印,不过这个译本至今也未见到,不知落于何处。

曾德昭也是早期在一本书中谈到中国的教育制度时讲到了孔子,他认为孔
子作为一个四处奔走的教育家和哲学家,总希望各国君主采纳他的哲学,尽管屡
遭挫折,但孔子不屈不挠。曾德昭对孔子这种人格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孔夫
子这位伟人受到中国人极大的崇敬,他撰写的书及他身后留下的格言教导,也极
受重视,以致人们不仅把他当作圣人,同时也把他当作先师和博士,他的话被视
为是神谕圣言,而且在全国所有城镇修建了纪念他的庙宇,定期在那里举行隆重
仪式以表示对他的尊崇。考试的那一年,有一项主要的典礼是:所有生员都要一
同去礼敬他,宣称他是他们的先师。”^④

① 王琦:《明清之际中学之西渐》,第 50 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 年。从我手中的这个西班牙原文本看,出
版时间应为:1592 年。高母羨另有《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这是 16 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

② 请看我的论文《罗明坚——西方汉学的奠基人》,《历史研究》2001 年,第 3 期。

③ 利玛窦:《利玛窦通信集》,第 143 页。

④ 曾德昭著、何高济译:《大中国志》,第 59—6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曾德昭认为,孔子的主要贡献就是他写了“五经”。对于《四书》,他没有谈更多,但提到《四书》一部分来自孔子,一部分来自孟子,他认为《四书》是在强调一个圣人政府应建立在家庭和个人的道德之上。他说:“这九部书是全国都要学习的自然和道德哲学;而且学位考试时要从这些书中抽出供阅读或撰写的题目。”^①

在孔子及其儒家世界观的介绍上,他基本遵循了利玛窦的路线,他介绍了儒家所强调的五种道德:仁、义、礼、智、信,介绍了儒家在处理父子、夫妻、君臣、兄弟、朋友之间关系的原则,这就是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中所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虽然曾德昭注意到儒家的世界观表现为天、地、人三个方面,但他对儒家所强调的天人合一、人天相通的基本立场并不太感兴趣。

他所关注的和利玛窦一样是早期儒家的崇拜上帝和敬天的传统,他说:

他们以孔夫子为宗师。他们不崇信浮屠即偶像,但承认有一个能奖惩的上天,即神祇。不过他们没有礼拜神祇的教堂,也没有他们作礼拜的神职,或者念唱的祈祷,没有牧师、教士为神祇服务。他们在书籍里很崇敬地记述和谈到他们的先师,把他当做神人,对他不可以有丝毫不敬的事,如我们的祖辈之对待他们的神灵。但因为并不完全清楚地认识真实的上帝,他们礼拜世界上三样最著名的强有力的东西,他们称之为三才(San, Cai),即天、地、人。只有在北京和南京的宫廷才有祭天、祭地的壮丽庙宇,但这只属于皇帝,也只有皇帝本人才能献祭。……

至于来世的灵魂,他们既不期望,也不祈求,他们仍然要求今世的现实利益、财富,并能取得佳绩和成就。

他们以此去激发人们的信仰,因为他们把天地当做自然父母去礼拜,他们同样可以尊敬自己亲生父母;同时,因为前代著名的圣贤得到崇敬,他们由此极力去仿效他们,又因他们去世的前辈备受祭享,他们可以学习如何孝敬活着的父辈。总之,在可能导致家庭内的治理、和谐、安宁、和平时,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妥善,并实施德行。^②

^① 曾德昭著,何高济译:《大中国志》,第59—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② 同上书,第104—105页及第二部分。

曾德昭这里对儒家宗教信仰特点的介绍基本真实,尤其是对敬天以及如何祭祀的介绍为具体,这些以后在西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社会伦理侧面来看,他认为儒教的敬主要在于教导人们对家族中父亲的崇拜,对圣人政府的尊敬,从而演化成一种社会生活层面上的伦理实践。在这点上,曾德昭倒是看得比较准确。

曾德昭这本书的另一特点是对中国基督教史尤其是对明末南京教案的介绍。在这个报道中可使人们感受到在东方传教的困难与特点,使西方人进一步了解到儒家对基督教的态度以及它的宗教观念,同时这也是对中国明代社会的一个实际报道,使欧洲人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①

曾德昭以后是卫匡国,他在《中国上古史》一书中也对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做了介绍。他说孔子出生于周灵五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19岁结婚。父亲在鲁国为官,孔子为追求自己的哲学和过更加自由、悠闲的生活而离开了家庭。23岁时孔子向老子求教,以后他离开鲁国是因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在鲁国无法实现。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开始周游列国,但各国诸侯都未采纳他的主张。孔子退而著书。卫匡国说,孔子在中国享有很高的地位,所有的帝王都尊重他,——人们把孔子的话当做圣言,中国的每座城市都建有孔庙。

另外,他还介绍了儒家的经典著作“五经”和“四书”,他说《大学》是“中国全部哲学的基础”,同时他也把《大学》的第一段译成了拉丁文。这是继罗明坚后有关《大学》部分译文第二次在西方公开出版,因它在出版时间上早于柏应理等人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因而在中国哲学在欧洲早期传播的历史中,《中国上古史》仍占有一定的地位。

《中国上古史》的另一引人注意之处是他对孟子的介绍,他说孟子是一位“非常高尚和极有雄辩能力的哲学家”,说孟子在儒家中的地位仅次于孔子,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他还简略地将孟子与梁惠王的谈话转译成了拉丁文。相比较于孔子,卫匡国认为孟子“有些学说是碍于基督教的”^②。由此看来,卫匡国的《中国

^① 曾德昭著,何高济译:《大中国志》,第104—105页及第二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② Melis Giogio,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lassics In The Works Of Martini S.J.(1614—1661)",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Inter-Change In Commemorate 400th Anniversary Of The Arrival Of Matteo Ricci, S.J. In China*, p.483, Taipei, 1983.

上古史》是儒学西传史中的一篇重要文献。它至少有以下两点特殊地位；第一，他较之以前更多地介绍了孔子和儒家思想，翻译了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献《大学》的片段。他的这个努力“对于欧洲了解关于中国的消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① 第二，他第一次将孟子及其著作和思想介绍到了西方，如果对比一下在其后出版的柏应理等人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就更体现出他的价值，因后者所谓的“四书直译”恰恰遗漏了《孟子》这篇重要的文献。

继续卫匡国的的工作并直接从事儒家经典著作翻译的是比利时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费赖之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将《中国哲学家孔子》作为其主要代表作之一。其实《中国哲学家孔子》并非一蹴而成，也并非柏应理一人之作，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实际上它是来华耶稣会士的集体之作。

柏应理 1659 年来华，后来在江西省建昌府传教三年。在这期间，于 1662 年和同伴用拉丁文翻译了《大学》和《论语》的前五章，为书起名为《中国箴言》(Sapientia Sinica)。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有的学者认为利玛窦最初的《四书》译稿已经丢失，有的学者认为利玛窦的《四书》译稿不是丢了，而是传了下来，作为后面新入华的传教士的语言教科书，因而利氏的这个译本成为柏应理《中国箴言》及至以后成为《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蓝本。这说明柏应理最初的这两篇译稿很可能是在利氏的译稿上发展起来的。^②

其中的《大学》译文出自葡萄牙传教士郭纳爵(Ignace da Costa, 1599—1666)，他 1634 年来华，这时他完全有这样的能力，费赖之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说：“拉丁文《大学》译本，雷慕沙云：《四书》译书首经欧罗巴人刊者即为是本。”

《论语》第一部分的前五章，即“学而第一”的前五章译文出自何人之手，此事至今没有定论。我认为，《论语》的这篇译者很可能是柏应理。因为“书的封面注有殷铎泽、郭纳爵同述”的汉字。而殷铎泽 1659 年才到中国，语言能力尚达不到这一程度。孟德卫教授也是这样认为，书的署名是柏应理，他不可能无功而名。所

① 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Origins Of Sinology, P110, Stuttgart, 1985.

② D E Mungello, "Aus Den Anfängen Der Chinakunde In Europa 1687—1770," Hartmut Walravens, China Illustrata Das Europäische Chinaverständnis In Spiegel Des 16bis 18 Jahrhunderts, S68,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Wolfenbüttel, 1987.

以，很可能《论语》的这五章出自他的手。这本书“木雕整板，用纸、体裁都是沿革中国风格，一方面用阿拉伯字注明页数，另一方面并用字注明”。^① 书内有 2 页儒学书目，14 页《大学》译稿和几页《论语》译稿。

柏应理之后，殷铎泽在 1671 年返回罗马期间，在旅途之中翻译了《中庸》，书名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Sinarum Scientia Politic Moralis)。书中除了《中庸》译文外，还附有《孔子传》。这本书共有三个版本，即 1667 年广州版、1669 年果阿版和 1672 年巴黎版，这部书包括一个前言，54 页《中庸》拉丁文译稿，8 页儒学书目。^②

经过这两个阶段才产生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这部书实际上是来华耶稣会士的集体创作的产物。当时正值杨光先教案期间，来华的耶稣会士除汤若望以外，大都被集中于广州，正是在这期间，他们共同商榷，完成这本书的工作。

共有 17 名传教士参加此项工作，除了上面提到的柏应理、殷铎泽以外，还有：聂伯多(Pierre Cunevari, 1594—1675)，热那亚人；何大化(Antoio De Gouvea, 1592—1677)，葡萄牙人；潘国我(Francois Brancati, 1607—1671)，意大利人；李方西上(Jean-Francois Ronusi De Ferrariis, 1608—1671)，意大利人；成际理(Felicien Pachco, 1622—1686)，葡萄牙人；利玛弟(Mathias De Maya, 1616—1670)，葡萄牙人；聂仲任(Adrien Greslon, 1614—1695)，法国人；穆迪我(Jacques Motel, 1618—1692)，法国人；刘迪我(Jacques Favue, 1610—1676)，法国人；洪度贞(Humbert Augery, 1616—1673)法国人；鲁日满，比利时人；恩理格，奥地利人。但 1687 年在巴黎出版时，直接署名的只有殷铎泽、恩理格、鲁日满、柏应理，书的副标题是用汉字形式出现的《四书直译》。

对这部书贡献最大的是柏应理，书稿是由他带回欧洲，由 Daniel Horthemels 出版。柏应理为此书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对全书的重要内容做了介绍，并附了一份八页长的儒家书目和一张孔子的肖像。在这篇序言中，柏应理开宗明义说明这本书并不是为欧洲读者写的，而是为了传播福音所做的，为了使来华的传教士们使用的。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从中国文献中挑选出这些内容，以便使到中国的

① 石田幸之助著、张宏英译：《中西文化之交流》，第 96 页，商务印书馆，1930 年。

②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 331—332 页。

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如果一些外行人看这部书,也应从传播福音的角度来理解。柯蓝妮(Claudia Von Collani)认为柏应理的这篇序言“不仅是一个历史性的报告,同时它对传教学的理论也有贡献。柏应理试图从现实主义的立场,毫无偏见地探讨中国传统活动的问题”^①。在这个序言中,他继承了利玛窦的思路,对新儒家展开了批评,他提到朱熹、二程(程颢、程颐)、周敦颐、张载。他认为新儒家的根本问题在于脱离了孔子传统,在“本质上是一种唯物主义哲学”。因为在他们看来,在孔子那里是敬天的,在孔子以前更是崇拜上帝的。而在理学那里,中枢性的概念是“太极”和“理”。柏应理引用了《易经》中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话,说在孔子那里“太极”并不是一个根本性的概念,而在新儒家那里,太极成了一个根本性的范畴。就新儒家的解释来看,太极就是万物之根,是原初的物体(Prime Matter)。

凡熟悉中国哲学的人都知道,“新儒家正式成立在北京。新儒家以古代儒家思想为本,而融合老庄思想、佛教思想及道教思想,更有所创造,以建成新的系统”。^②新儒家是儒家思想家在中国古代发展的高峰,它将原儒的伦理化向一种抽象化、本体化方向发展。在朱熹那里,“太极”、“理”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他说:“自下推上去,五行只是二气,二气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来,只是此一理,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多具理,所乾道复外化,多正性命,然总只是一理。”^③

实际上朱熹的“理”、“太极”,很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和黑格乐的“绝对理念”。但传教士们则把他们理解成了德谟克利特或伊壁鲁的学说,把孔子的思想解释为一种自然理性,把新儒家判定为一种唯物主义学说,传教士的这两个基本点直接影响了17—18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从而产生了完全意想不到的解释和结果。

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中,柏应理除这篇长篇序言以外,还写了三篇历史年表,“第一表始纪元前2953年纪元初,第二年表纪元1683年,第三表三皇系

① Claudia Von Collani, "Philippe Couplets Missionary Attitude Towards The Chinese N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Jerome Heyndrickx, C. I. Cm: Philippe Couplet, S. J. (1623—1693)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 Steyler Verlag 1990.

②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③ 朱熹:《朱子语类》卷94页。

表,载2457年间黄帝以下86帝王世系”。

书中另有殷铎译的《孔子传》和《大学》、《中庸》、《论语》的译文。据美国学者孟德卫研究,他们在对《中庸》、《大学》、《论语》翻译中并没有忠于原文含义,而是从基督教的角度做了重新说明。但首次全译《中庸》,殷铎译功不可没,而他的《孔子传》亦是西方第一本的专题研究。

孟德卫把《西书直解》称为“耶稣会士在中国适应的最高成就”。这本书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于柏应理在扉页上写的是“献给法王路易十四”从而就得到了路易十四的支持。著名哲学家莱尼茨也看到了这本书,并对他产生了影响。丹麦学者龙伯格在谈到这部书的影响时说:“孔子的形象第一次被传到欧洲。此书把孔子描述成了一位全面的伦理学家,认为他的伦理和自然神学统治着中华帝国,从而支持了耶稣会士们在近期内归化中国人的希望。”^④

柏应理等人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1688年由法国人 Pierre Savouret 出版了法文的改编版'La Morale de Confucius, Pilosophe de la Chine'(Amsterdam)。1691年由英国人 Randal Taylor 在伦敦又出版了改写版的英译版'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在这个英译版中孔子被描绘成一个自然理性的代表,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书中是这样介绍孔子的:

“在孔子的祖父去世以后,孔了自己专心于老子(Tcem-Se)理论,他是孔子时代一位很有声望的学者。在这样一位博学大师的指导下,孔子对中国古代风俗习惯进行系统地整理和研究,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孔子为了获取这些知识耗尽了一生的精力。

有一天孔子同一个有权力的人谈话,这位贵族对中国的古书并不清楚,他对孔子说没有必要费时间去研究这些书。孔子说人们总是很草率地看待这些书籍,实际上一个人如果不读这些书,就无法获得完善的知识。……孔子的批评很有效,那位贵族哑然无声。”^⑤

英译本的这个介绍虽然错误不少,但孔子的形象还是生动的。孔子的思想也

④ 龙伯格:《理学在欧洲的传播过程》,载《中国史动态》1988年,第7期,参阅龙伯格的《宋程理学在欧洲的传播》一文,见《国际汉学》,第5期,大象出版社,2000年。

⑤ E Letes, "Confucianism In Eighteenth Centenary England: Natural Morality And Social Reform," Actes Du li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Iv, P 68, Paris, 1980.

对英国产生了影响。柏应理等人的《四书直解》出版后几十年,奥地利传教士白乃心(Jean Grueber, 1623—1680)于1679年在佛罗伦萨出版了他的《中华帝国杂主记》一书,书中附《孔子传》及《中庸》译文。其中《孔子传》、《中庸》译文都是采用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中的内容。

基歇尔在他的《中国图说》中也简要介绍了孔子的思想,他说:“在中国最古老、土生土长的是儒家,他们统治着这个王国,儒家有很多书,比其他学派的人受到更多的赞扬。他们承认孔子是其学派的奠基人,是第一位哲学家,正像埃及人对待 Thyt 那样。同样,中国的儒家不崇拜偶像,正像孔子所教导他们的那样,他们只尊崇一种神,他们称之为‘天’,也就是上帝。”^①

在当时对中国宗教、哲学思想的介绍中引起最大争议的是李明的《中国现形势志》(Nouveaux Memoire sur L etat present de La chine)。这本书1696年在巴黎出版,它深深地卷入了“礼仪之争”之中,Sorbonne 神学院花了整整两个月时间开了三十多次会议对李明这部书进行了审查,有160个神学家发表意见,在后来的投票表决中有114个人赞成出版,有46人反对,一时间这本书成为耶稣会护教的代表著作。

在这部书中,他用了六页纸的篇幅介绍宋代儒学,他向欧洲介绍了三个人,即周敦颐、邵雍、朱熹。李明并没有采用“新儒家的概念”,而是说他们是一个“哲学学派”。在介绍他们的哲学观点时,他认为宋代哲学家主张自然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而“理”则是自然中最根本的原则。李明说,中国人把宇宙比喻成一个大的建筑,在这个建筑中,“理”处于顶端,也就是这个理作为基本原则联结和支撑着构成这个结构的所有部分,维持着自然的整体。

李明还专门介绍了朱熹的《太极解义》。我们知道,《太极解义》是朱熹的重要著作,它是朱熹确定了“太极”的本体论基础。他说:“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气也。”这里朱熹说明了“本体是太极,动静阴阳是理(太极)借以表现的外在过程”。^②

李明认为,朱熹过分强调了这一个原则,太极在周敦颐那里虽然是一个不依赖

^① Athanasius Kircher, *China Illustrata* 该书的中文译本不久将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② 陈来:《朱熹哲学研究》,第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于其他的原则,但朱熹扩展了这个含义,使太极成为第一原则。显然,李明并不明白宋明理学从周敦颐经张载到二程最后到朱熹的演化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李明在这里对理学的介绍采取的是一种同情式的描述,并没有像龙华民那样对理学采取批判的态度。

龙华民的《关于中国宗教若干点之记录》一书是来华耶稣会士向西方介绍中国哲学和宗教的重要代表著作之一。如果说利玛窦突出的是原儒,强调原儒与基督教的一致性以阐明传教的必要,那么龙华民突出的是新儒家,强调新儒家中的“唯物主义成分”,以说明祭孔是不应该的。龙华民的原文为西班牙文,载于闵明我(Fernandez Navarrete, Domingo, ? —1689)神甫所撰的《中华帝国的历史、伦理和宗教纲要》(*Trad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 Ethicos, Y Religiosos de Mornarcia de China*.)一书中,经西塞(De Cice)主教译为法文。后译为英文“*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Historical Political, Moral and Religious*”。龙华民认为利玛窦等人把“中国人的上帝等同于西方人的上帝……是错误的”^①。他认为中国哲学是自然主义的,是与基督教思想不同的,尤其是宋儒所说的“理”,“太极”,实际上讲的是一种物质世界的本原,它们本身也是物质性的,而不是神性的。龙华民对理学的介绍引起了当时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极大注意。以后的莱布尼茨及其弟子沃尔夫专门深入地研究了理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开创了中西比较哲学之先河。^②

继柏应理等人以后,对孔子和儒家的介绍,一直成为来华耶稣会士的主要工作之一,从下列他们的著作表中就可以看出他们这种不懈的努力。

安文思:

(1) 《中国之二十优点》,“历述中国之古典、文学、风俗、宫室、商业、工场、航务、政治诸门。”

(2) 《孔子书注》,安文思用汉文写的著作,他自己“又曾撰有孔子书注,以备

^① Fernandez Navarrete, Domingo, *An account of the empore of China, historical, political, moral and religious*, p.183, in Churchill, 1744.

^② 儒家向西方的传播除了以上讲的这种方式以外,还有一种完全根据西方人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对孔子和儒家思想做新的加工、改编和阐释的方式,法国人来华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年)的《自然之码——孔子的诗》就是这种阐释方式的代表,见朱静所译的此诗,载《国际汉学》第5期,第90—102页,大象出版社,2000年。

新莅此国者之需”。

(3)《孔子遗作全解》。

卫方济(Francois Noel, 1651—1729)。

(4)《中庸》译本。

(5)《孟子》译本。

(6)《中国哲学》四开本,1711年在布拉格出版。

(7)《中国哲学简评》。

(8)《中国六部古典文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小学》。

刘应(Cl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

(9)《孔子第六十五代孙孔胤植传》。

(10)《中国〈四书〉之年代》。

(11)《中国七子赞》。

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

(12)《自然法典》,此书是翻译孔子的诗篇。^①

马若瑟(Joseph-Henry-Marie de Premare, 1666—1701)的《中国语言志略》虽是一部文法书,但书中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古籍文献,儒家的主要著作从先秦到宋几乎都有所涉列,因而此书的意义不限于中国语言,它也是中国儒学在西方传播的一部重要著作。

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

(13)《孔子传》。

(14)《孔传大事略志》。

(15)《孔子诸大弟子传》。

钱德明是在中国的最后一名耶稣会士,从利玛窦到钱德明,他们对孔子及儒家的研究日益加深,到钱德明时,他已经成为“一个研究孔子的历史学家”。

^① 朱谦译为《自然之码——孔子的诗》,朱谦子先生认为此书是伪书。